

他们点亮了2021内蒙古文学的星空

□赵富荣

2021年6月,特·宣布扎布的《人类笔记》出版。作家出版社类似于羊皮书的封面设计,“一份献给人类的特殊礼物”“它破解了我们人类这一物种未被破译的生存密码”的推荐语,无不在标识这部书的与众不同。这是一部大书,时间上将自人类太古时代到联合国成立的漫长过程以通史的形式演义,空间上涉猎了人类在地球上迁徙的重要足迹。这也是一部有着独特视野的书,从人类最本能的需求出发,在对生存资源再分配的博弈的解读中,书写着人对自身、对群体、对世界的建设和毁灭,也诠释着卢梭的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作者始终坚守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不被汹涌而来的历史淹没,以自己的语言风格,传达出作为人类一员对自身的解读和思考、热爱和悲悯。作者在创作谈中说:“站在东方文化的根基上,面向人类说话是需要勇气的。同样,在没有文本范式的前提下推出这些文字,也是需要勇气的。”是的,站在东方文化的根基上指点人类的作品相对少,而以这样的个人视野、个人表达解读人类社会发

展史的,更是少之又少。中国文学的范式都是在中国作家艰辛的创作中建立的,就如批评家李浩经常提醒我们的,“所谓文学史,本质上应当是文学的可能史”,“凡墙皆是门”,中国文学的范本也是在勇气和创作热情的鼓舞下写就。

2021年第一天,艾平的散文《翡翠之江》在《光明日报》刊发,这是新年对作家最吉祥的祝福。这一年,他的报告文学《在这片奋斗的土地上》在《人民日报》刊发,散文《五彩羊明镜》《原始森林之路》在《文汇报》刊发。2020年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春风染绿红山下》由德国欧洲大学出版社翻译成英文出版,2019年在《人民文学》刊发的中篇小说《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也将翻译出版。评论家易新在《人民日报》刊发的评论《〈春风染绿红山下〉——来自脱贫攻坚一线的感人故事》以“作品贴着人物写、作品贴着现场写、作品贴着细节写”总结了其相较于同类题材创作的特色。艾平的报告文学常在大家熟悉的题材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写作属性,始终让写作贴近事物、细节、常识和现场,让作者和读者的感官都活跃起来。《五彩羊明镜》《原始森林之路》延续着艾平散文的一贯宗旨——描写生活现场,大地细节,一笔一画刻录呼伦贝尔记忆。这种记忆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以现在进行时态、以更多“途中视角”而非“终点视角”写作,让读者从旁观到参与、从被告诫到共分享,把小说、报告文学的写作经验引入到散文中,为读者带来更为生动复杂的审美体验。

这一年,布仁巴雅尔的报告文学《嘎查的路,怎么走》、瓦·哈斯的长篇小说《益希班觉》相继出版,路远担纲剧本创作的广播连续剧《坚守可可西里》播出,诗人白涛、温古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孜孜以求。这些耳顺之年的作家们有着艰辛漫长的创作生涯,也屡获殊荣,因为热爱,所以一直在创作的路上绽放光彩。内蒙古老作家用关注人类、观照现实的重要作品,为建党百年献上一份诚挚的祝福。“70后”的赵卡、赵耀东、韩伟林、杨瑛、刘慧春、谢春卉,“80后”的何君华、娜仁高娃、牛海坤、李亚强、张小花,都以不凡的业绩向文学致敬。这些创作者赓续着内蒙古文学的优良传统,站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寻找精神的故乡、写作的故乡,寻找属于自己的语言,也在寻找中确立了自己的写作风格。

2020年,“70后”作家海勒根那凭借短篇小说集《骑马周游世界》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21年,他的短篇小说集《请喝一杯哈图布其的酒》入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并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这些阶段性的成果,是对他30年坚持创作的褒奖,他从诗歌写到短篇小说,把诗歌的境界写到了小说里,把小说的叙事

带到了诗歌里。2021年4期《草原》刊发的中篇小说《巴桑的大海》被《小说月报》转载,入围“2021年收获文学榜”;在《花城》刊发的《放生马》被《小说月报》转载。在这两篇小说中,他把叙事的悬念和言外之意与原乡、寻找、远行的主题相结合,让小说保持着轻盈和飞翔的姿态。在他用想象力、感染力、魔术能力营造的氛围中,自由、理想和信念那么隐秘地感染着读者。《巴桑的大海》中故去的父亲扶他上马、海螺声中传来召唤,《放生马》中云青马转生,“我”和祖父鬃尾飞扬、四蹄如风,自然和非自然、事实和想象、历史与现实彼此交织在一起,让小说整体的诗性和局部的诗性相勾连。

2021年,广子的诗歌创作成绩依然丰硕。诗歌《生日,与母书》2020年在《人民文学》发表后,被《新华文摘》于2021年6月转载。组诗《秋风在迁徙的队伍中安插了两只翅膀》2021年4月在《诗刊》刊发,其中《红草滩的红》《我听见篝火说》《大雁飞过》分别入选中国诗歌网“汉诗英译”、《中国当代文学选本》和诗与摄影集《暖言》。“需要多么沸腾的雨/才能煮熟一只漂泊的饺子”,“篝火是一种语言/但它什么也没说/我已烧成了一堆灰烬”,“我以故乡的名义挽留过大雁/但秋风在迁徙的队伍中安插了两只翅膀”……广子让叙事进入到诗歌,增加诗歌的丰厚感、亲历感,增强其自由度。他也擅于截取片段,以“诗眼”般的句子,让想象力飞升,保持着诗意的充盈。

2021年,许廷旺依然在儿童文学的领域勤奋耕耘,出版《儿童文学名家精品典藏馆·远去的百灵》《甜津津的甘草》等著作,以斐然的创作实力在他所喜爱和熟悉的领域驰骋向前。云韬在《许廷旺动物小说的叙事特色》一文中说:“许廷旺的小说以叙事性见长,其难能可贵之处正在于聚焦动物与动物之间、动物与人之间的关于生与死、爱与恨的生命纠缠,跳出一般人类故事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情节模式,在精心铺垫的场面与环境中的展现力与力的正面对决,使许廷旺擅长的悬念营造手法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由接踵而至的惊险场景衔接而成的小说,屡屡让人目不暇接,手不释卷。”

2021年,肖睿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打雪仗》,在“ONE·一个”连载了《太阳雨》,“《打雪仗》讲的是空间,我希望通过一本小说,讲人在扭曲的空间里如何变形。《太阳雨》讲的是时间,我想让时间像雨一样,不停地打在人性上,看看有没有不变的诺言。”肖睿这两部长篇都是在民间借贷导致金融崩溃之后的人性变化为主要内容,他不断用文字击打灵魂,在变动之中寻找一些可以持守的东西。魔幻的故事和人生,都在平静克制的叙事、亦庄亦谐的语言中一一呈现。

2021年,安宁散文集《寂靜之声》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用一个或孤独或热闹人间故事,承载对自然虚空事物的思考与描写”。这一年,她以散文集《迁徙记》获得三毛散文奖新锐奖,并保持着每月至少有一篇作品在刊物上发表的频率,单篇散文《一株金银木点燃了冬天》《有人路过眉山》《河流》《终生坊》分别刊发于各报刊。作为一个“80后”创作者,她已经出版27部作品集,成果丰硕。作为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教师,渡澜、苏热、田逸凡都是她的学生,在她的引荐下,各大刊物上出现了内蒙古“95后”“00后”作家锐利而挺拔的身影。

2021年,“渡澜的童话”依然在延续。她以作品《山丹姐姐的羽毛》获得第六届华语青年作家奖短篇小说奖双子奖,是这个奖项设置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颁奖词介绍,她的叙述打破了惯常的逻辑必然性,以一种非线性性的诗歌语言讲述那些奇幻而异质的故事,从而为作品打上自己独特的个人精神烙印。短篇小说《威风老虎》在《十月》单月号3期刊发,卷首语推介,年轻写作者爆溢的

语言才华,陌生、神秘、异族想象力,为汉语带来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与写作语法。陈鹏在《人性的“风暴”与失真的“温暖”——读渡澜、韩东小说》中的分析,可以作为对渡澜小说的进一步注解:“渡澜小说堪称目下文坛的异数之一……这是一种高风险的写作……她专心致志的就是语言和语言的碰撞,就是毫无忌惮的游戏和反游戏。”《长江文艺》在2021年11期推出4篇关于渡澜小说创作的评论,这些评论对渡澜特立独行的创作既惊叹赞美,也宽容接纳。对于渡澜,是否会留下“仿仲永”的感叹,她会在成长和创作中给出答案,让我们静待花开。

苏热的短篇小说《胶囊》在《草原》刊发,短篇小说《不眠艺术》在《山西文学》刊发。评论文章《复魅新视角下的青年创作》在《文学报》刊发后,全国文学报刊联盟以《青年写作:如何把个体经验扩大为更易接受的经验》为题转载。苏热的作品不多,却用有质地的书写制造了诸多惊喜,《胶囊》应该属于苏热“黄镇系列”的范畴,在一个不那么圆润的故事里,“书写个体精神、个体经验的猎奇与探索……更具体地立足于人物的精神诉求与困境……孤独、死亡、迷茫、恐惧,一系列母题心境,营造出一种独属于青年作家的奇遇世界”。苏热的故事更多的是探索,而不仅仅是猎奇。他在创作中,用更为平实的表达,从个体经验、感受出发,形成一种思考的传递、一种共同经验的开拓。这个来自河套平原的青年,像米沃什那样,保持着一个地方人的谨慎,也对他挚爱的文学,在不急不躁的创作中,付出更多的思考。

田逸凡2021年在《草原》刊发了短篇小说《求你们告诉我》,在《青年作家》刊发了《晚晴》《泥沼》两个短篇,并配发了老师安宁的评论文章《“零零后”田逸凡笔下的家庭生活》。小说《求你们告诉我》是对世俗生活的深度介入和不言自明的记录,那些记录没有按照起因、经过、结果去讲,以闪烁其词的记录,让幻觉、记忆、现实混杂在一起,把可能所谓的真相,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情呈现出来。《泥沼》《晚晴》以家庭关系为主题,就如徐晨亮在《家是自我的剧场,家是经验的丛林》中所言:“作者展现了以家庭为观察原点,深入丛林般幽深复杂之现实经验的文学能力……其实处理家庭生活这类经验的能力,更能代表年轻写作者的潜力与可塑性。”“00后”的田逸凡刚刚上路,相信贴着生活书写的创作途径,会让他的写作之路更为坚实一些。

盘点内蒙古的新锐创作,“00后”的晓角也堪称一匹黑马。2020年,17岁的晓角在《中国校园文学》相继刊发组诗《一个少女的冬天》和散文《我的植物世界》《扶贫家》,展现了自己的才华。2021年,晓角在《诗刊》刊发了《坐在青草长出的土路上》,在《草原》上刊发了组诗《改变》《土豆城的公告》,以及小说处女作《清冷之人》。霍俊明在《失去的与赢得的——关于晓角的“诗与生活”》中说:“晓角所呈现的生活与诗歌的对应、转化关系,我们可以说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我们生活,也在帮助或修正我们的生活,甚至拓展了我们关于生活的理解和想象。与此同时,诗歌在时间的惯性延续和生存漩涡中还承担了镇静剂的功能。”晓角在文字里介入生活和逃避生活,寻找我与自我、我与他人、我与世界的相处方式,这也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命题。只是这个命题过早地被晓角感知,于是,她把生活、生命、精神意志都灌注在文字里。

雏凤清于老风声。这些“95后”“00后”的作家,他们把经典阅读和对生活的理解结合起来,书写他们正在探求的世界,也在书写中确立如何和自身、和他人、和这个世界对话的模式。他们以锐利的青春写作,展示着自身的才华、智慧和对文学的理解,也和内蒙古老中青作家一起点亮了2021内蒙古文学的天空。

了一容发表于《天涯》2021年第4期的短篇小说《玉狮子》,被《小说月报》2021年第9期转载,并入选《中国当代文学选本》第七辑,引起广泛关注和好评。小说取材于作者自己的一段放马经验,通过写一匹特立独行、高洁如玉的母马玉狮子被困,被热爱读书的牧马人伊斯哈格精心营救的故事,诗意地写出人和马、天和地的和谐旋律,张扬坚韧的理想和信念,让人感受到异域风情和诗性、神性、灵性,体现了作家独特的精神品格和审美风格。

小说的叙述视角独特而新颖。和了一容前期作品中以故乡西海固的父老乡亲 and 底层民众为描写对象不同,这次他将镜头投向广阔的天山深处的草原,关注特定时期人与自然相融相生的重大主题,努力写出草原上牧民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世界。了一容少年时曾有过去新疆草原放马的经历,他对草原的热爱和对牧民生活的真切感受,成为他难以忘却的生命记忆,其小说中的人物大多带有作者自己的影子。

《玉狮子》的故事情节特别简洁,但却很有张力,单纯而又繁复。一个叫伊斯哈格的少年逃离故乡,挤火车来到新疆,在天山深处的草原放牧。在他放牧的马群里,有一匹叫作玉狮子的母马被困,伊斯哈格精心营救,最终成功将它带回。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在了一容笔下却变得诗意浪漫、丰富多彩。小说起笔就与众不同:“‘艾布家的马匹越来越多,没个人放牧,打算花血本找个放牧的巴郎子呢!’哈里克的婆姨罕古丽对丈夫说。”通过雇主夫妇的对话,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将读者引入迷人的故事当中。

我曾在《民间叙事与底层观照》(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5期)一文中论及了一容小说的民间叙事视角,他的目光总是向下的,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低,乃至于敢把自己不如人意的生存状态展示出来。他始终以民间的视角、最底层的身心关注人的生活,渗入真挚的情感和人文关怀,这在《玉狮子》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印证。小说叙述节奏缓慢而自然,仿佛山间流动的小溪,清澈而透明。小说主人公伊斯哈格从家里逃出来,挤上从内地发往新疆的火车。“他正要把头从窗外缩回去,可是一道从未见过的风景,闪电般击中他的小心脏:原来火车顶棚和窗户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麻雀,这些小精灵也搭乘火车上新疆呢。麻雀由平日里在村子的树冠上的叽叽喳喳和争争吵吵,变得一声不响,仿佛用一种庄严肃穆在向曾经养育过自己的瘠薄的土地作最后的道别。”这种视角的展开和描写鲜活而生动,把伊斯哈格和麻雀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将人和动物的关系引入到大草原之上,重新加以审视,悉心观照人类命运与大自然整体的相互关系。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文人人生态度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诗歌)最完满的审美境界。然而,当下人类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危机,尤其是自身生存的空间和自然环境。一容在《玉狮子》中写到:“记得在村子里时,伊斯哈格常见大人们摇头叹气,说是干裂的土壤已经被破坏了,从国外引进的粮食种子完全代替了以前种子公司那些传统的种子,种子公司和农民再也不留种了,农家肥也被国外的化肥替代了……农民们渴望能恢复以往的那种传统的施农家肥的种植方式,然而种子却找不回来了。也许有一天,即使种子找回来了,但不知需要多少代人才能恢复土壤的健康和元气啊!人们放弃家园,奔往口外。新疆口外大呀,随便养几只羊都能活人。那些灵性的麻雀,也跟着人乘火车上新疆了。”也许,这是伊斯哈格逃出故乡的根源。而在天山深处大草原上,人和马、天和地,显出了应有的默契和谐,但人与人之间、动物与动物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伊斯哈格在草原上放了几年马,还是赤脚片子在草原上跑,雇主连双鞋子都不肯给买,他的两只脚经常被扎伤,流血流脓;玉狮子不肯顺从“大特级”“大特级”维护的秩序被它一次次颠覆;两只野狼带着狼崽子闯进哈里克家的羊圈,咬倒羊只……了一容满怀悲悯之心写下这些,意在唤醒人类的良知,维护自然界的整体和谐秩序,以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了一容流浪新疆时曾随身携带《老人与海》和一本《新华字典》,通过阅读来寻找快乐。在《玉狮子》中,作家引用《老人与海》中的两段话,其寓意也在于呼唤人与自然的相互交融及人与社会的和谐一致。这些内容使作品变得博大,个人的世界和人类的世界发生关系,小说有了宏大的世界观。了一容特别重视细节的构成和刻画,他的小说构思都比较精巧,《玉狮子》的情节设置和细节描摹贴切到位,并侧重点从精神、思想的角度来结构小说的故事、情节。“他骑上玉狮子,冲下山丘,向北斗星指引的方向飞奔。那些狼只是远远地跟着,不敢紧追上来。因为马给人壮胆,人给马壮胆。当生命有了伴侣,一切都变得不那么恐惧和孤单了。”这些情节刻画精细,充满隐喻和哲理,显示出作家对自然的深切体验和观察能力,以及对于精神世界的追寻和思考。在《玉狮子》中,其笔触显得十分细微,以多种方式塑造人物形象,挖掘出人性的真实与荒诞,给人以启迪和反思,造成了独特的艺术效果,人民性和抒情性得到充分彰显。

《玉狮子》以中亚大地深处的草原为背景,以诗意化的描写展现出浪漫主义色彩。“此时,哈里可家的晚饭已经吃了,天已经黑下去了,暗影慢慢地遮盖了草原上的一切,远远近近的,黑咕隆咚的,夜的颜色有厚有薄,给人一种草原神秘的力量。草原深处星星点点的帐篷里闪着忽明忽暗的星火,像磷火似的。”“整个草原上,一派深邃,草海在夜间显得愈益苍茫。回头看,马厩的轮廓和村舍也渐渐变得模糊,就像淹没在黑色的潮水之中。”“一白一黑,两匹马在草原上飞奔追逐,在地平线上旋转,大地的胸膛上传出密集的鼓点般的节拍。”诸如此类的诗意化表达,在《玉狮子》中比比皆是,生动而充满诗性、神性,有些地方犹如神来之笔。诗化语言的使用,鲜活生动,形象感人,体现了一容小说的审美趋向。整篇小说以写意笔法和抒情语调画出天山深处草原的美,带着音乐般的旋律,节奏感明显,宛如大草原的浪漫曲。

《玉狮子》以拟人化的手法写马:“玉狮子在哈里克家的马群里是最漂亮的一匹黑马,从来都是干干净净,全身雪白雪白的,让大特级情不自禁地眼馋,多次都想扑上去震撼它,让它变成自己的妻妾,但都遭到玉狮子猛烈的拒绝和反抗,均以失败而告终。”这种语言生动而传神,显示出马的个性,而这匹桀骜不驯的玉狮子就像放牧它的人一样,追求生命的自由,追求美好的生活。但现实并非如此,伊斯哈格逃离故乡,来到草原放牧,不但没有鞋穿,还要经常遭受主人的打骂。“牧马人有牧马人的规矩和讲究,更有牧马人的责任和尊严”,为了维护牧马人的责任和尊严,伊斯哈格连夜追寻玉狮子,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带回玉狮子,人与马、马与人之间达成最终的和解。这也从侧面折射出生存的不易和生命困境的消解。

了一容曾说:“文学艺术是给人类提供某种人文关怀和供整个人类进行自我反思的,它的情怀在于对所有的人的命运的关注,也就是人们惯常所说的悲悯情怀。”《玉狮子》在诗意化的表达中,也蕴含着作家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在小说结尾,诗意美更显得更为贴切——“天快亮了,洁净无染的大海一般的草原上,一抹薄纱一样的色彩微微地向大地铺陈开来。钢蓝色的亮光在草原的地平线上一点一点地释放。”“哈里克两口子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种温情、舒缓、自然的诗意风格,升华了小说的意境和主题。了一容的小说总能让我们看到生命的美好希望和亮光,在丰富的生活体验和情感传达中,了一容将我们带到一个独特而奇妙的世界,一起去感受草原的深邃、宏大和繁茂,在对自然的深深敬畏中追寻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读了一容小说《玉狮子》——
□杨建虎

独特视角与诗意表达



劳动的治愈抑或题外之义

——读阿慧《大地的云朵》

□刘 军

容易尘埃满身。即使有壮行时的大喇叭,有相关的新闻报道和影像采集,但它们将会一再冷缩,并最终演化为冰冷的数字,躺在不为人知的暗角里。文学的书写,当然不是采集数据或者提供命题,而是使用以少总多、以点代面的处理方式,通过激活一个人,进而让历史与过往与现在及将来,在同一个维度里实现“共在”。卡西尔曾在《人论》里指出,一个伟大的抒情诗人有力量使得我们最为朦胧的情感具有确定的形态。因此,《大地的云朵》所讲述的故事,既是一种记录,也是一种激活,让周口摘棉工以鲜活的方式凝固在文字里,借以抵抗时间的淬火,这也许就构成了作家写作的心理源动力。

与一般小说聚焦于一个或两个典型人物不同的是,这本纪实文学集子,选取了32个人作为刻画对象,作家辗转多个农场,与摘棉工同吃同住,一路风尘中洞见了一张张独特的面孔。他们以女性为主体,间杂个别男工,另有任二超这样因成分不好青年时期流落新疆的“盲流”。在刻画人物肖像时,作家的“成像”路径有二,一是在涉及人物在故土世界的过往以及来疆动机时,以人物的自我阐述为主体,作家积累的数十万字的采访素材因此派上用场;二是人物在现场的劳动习惯、穿衣打扮、吃住细节等,则转换到一客观观察者的眼光之下。如此这般,自主性叙述带来的是活泛,是活色生香,而观察者的视角则带来了细节的捕捉,主观性与客观性相互交织在一个人身上,个体的血肉之躯、性格特征、观念想法便得以立体地仁

个性、情爱萌动等等。《大地的云朵》所聚焦的成年女性主体,其背景性因素则较为单一,读者在她们身上可以轻易识别出家庭和土地的气息。对于这群女工而言,家庭和土地是一种朴素的颜色,也是生活的本源所在。因此,尽管她们各自有不同的故事,拥有不同的经历,但聚合在一起,更像是一代人。世世代代的中原女性皆是如此,隐忍、自我牺牲、视粮食与土地为生命,不被生活如何磨擦,依然乐天知命。当然,她们也很容易被遮蔽,书中有这样的细节,当作家拿起纸笔去记录谈话之际,很多摘棉工往往在开始的时候含羞摆手。一方面,在他们朴素的观念里,上报纸和上电视的人应该是有身份的人,她们配不上文字和画面的凝视;另一方面,她们担心自己的话语流转到几千里之外的故乡,遭受误读。她们的顾虑里既有农民的诚实,又有农民式的机智。

恰如阿慧在后记中所言,在新疆,随着机械化的大规模普及,规模性赴疆摘棉将很快成为历史。这也就意味着,一旦历史不再重复,那么历史中的事件之存在就很